



意识形态与乌托邦

当代影视文化研究的理论与方法

知识分子是在社会知识的
创新与积累上负有重要使命的社群，他们在
大众文化环境中的生存方式
深刻影响着
影视文化研究话语的生成

邓光辉 | 著

文化艺术出版社
Cul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J909.2
D272

电影丛书·丁亚平主编

意识形态与乌托邦

当代影视文化研究的理论与方法

邓光辉 著

文化艺术出版社
Cul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意识形态与乌托邦: 当代影视文化研究的理论与方法/邓光辉著.

- 北京: 文化艺术出版社, 2005. 7

ISBN 7-5039-2811-5

I. 意… II. 邓… III. ①电影-文化-研究-中国-现代

②电视(艺术)-文化-研究-中国-现代

IV. J90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090272 号

意识形态与乌托邦

——当代影视文化研究的理论与方法

著 者 邓光辉

责任编辑 胡 晋

封面设计 彩多设计

版式设计 刘宝华 廖安亚

出版发行 文化艺术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北里甲 1 号 100029

网 址 www.whyscbs.com

电子邮箱 whysbooks@263.net

电 话 (010) 64813345 64813346 (总编室)

(010) 64813384 64813385 (发行部)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三河市国英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05 年 8 月第 1 版

2005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87 × 1092 毫米 1/16

印 张 13.875

字 数 160 千字

书 号 ISBN 7-5039-2811-5/G·531

定 价 25.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印装错误, 随时调换。

序言 学术乌托邦

尹 鸿

本书的作者曾经是我指导过的博士研究生，本书的主体也是在他的博士论文基础上修改完成的。几年过去了，不仅因为我自己所服务的学术机构的变化和我自己所处的环境和位置的变化，已经很难再指导学生写作这种形而上的文化研究论文了，而且本书的作者本人也因为其工作环境和生存位置的变化渐渐远离了这种学术思考。但是，我始终以为，我们的变迁并不意味对我们曾经心仪的东西的否定。我们曾经思考和写作的一切，不仅作为个体生命的历史和文化历史的一部分存在过，而且仍然像血液一样，在我们疲惫的身躯中流淌，并且促使我们在舟车劳顿的匆忙中不能忘却那所谓头上的星空和心中的律令。

本书的意义首先在于它不仅借助曼海姆视野中的意识形态与乌托邦概念考察了西方知识分子和中国知识分子如何通过对当代电子媒体的研究批判性地介入了当代文化的建构，而且也通过思考这个社会的思想知识与实际生存状况间的联系，表达了自己的学术乌托邦的理想，以完成某种意义上的对社会知识的再认，对

中国大众文化历史功能、影视文化研究理论框架、转型期社会文化逻辑、知识分子历史责任的思考与展望。

从这样的出发点来看，本书的学术贡献首先在于它相当系统地梳理了20世纪西方知识分子，无论是杰姆逊还是曼海姆，葛兰西还是威廉斯，本雅明还是布尔迪厄，在解释资本主义文化逻辑的意义上提供的影视文化研究的知识谱系。其次，它相当深入地考察了当代中国，体制内代表、知识分子、民间对当代电子传媒文化的不同认知和认知立场，从而还原了一种当代中国相互依存和相互冲突的文化格局。最后，也是最有思想原创价值的特点，本书还试图寻找西方理论话语与中国本土现实之间的桥梁，对“创造性转化”寄予了热情——而这，也是当初我对他的博士论文写作时最大的期待。我始终认为，这种转化，不仅是一种学术需要，也是他超越自身、成就自己的一种需要。

我一直非常赞许邓光辉那种理论的热情，那是一种超越了对自己的肉身和处境的关注的一种更广大的情怀，也是对自己日常生活的一种精神救赎，是一种脱离了小我的自由的境界，是学术创造的一种乌托邦。就像光辉自己所说，“知识分子，这些时代的守望者，更会在自己的话语行为和实践行为中企图窥见时代的真理”。光辉的这种气质应该说已经反映在他的博士论文和这本书中了。我想，对于他自己来说，这本书始终会是一笔财富。

本书最后这样写到，“在这个年代，最伟大的革命发生在无形的经济现实之中，最现实的柴米油盐行为蕴藏了大时代的秘密，而内心生活，在现代人孤独的寻找和自恋中成为奢侈品，自恋成为交往绝望的必然后果。”的确，物质的诱惑、金钱的魅力，更重要的是被消费主义所创造的贪婪的欲望，已经将人们越来越牢固地捆绑在生活的挣扎中，我们只能用不断更新的手机、电脑、名牌服装、奢侈商品来安慰我们疲于奔命的灵魂，而思想的自由、思考的自由已经越来越成为一种妄想。所以，重新阅读本书，其实提醒我们的还是一种生活的态度。我们不能总是匍匐在地，心灵是需要翱翔的。

当然，文化在行动，人也在行动。我们思考，更重要的是我

们也在作为。所以，无论我们今天正在做什么，但是，当我们翻开我们曾经写作过的这些文字，我们还会感受到一种知识的力量、一种批判性知识的力量。那么，我们的行动就有了一种意义在——以此，与光辉共勉。

目录

序言 学术乌托邦/尹 鸿 /1

第一章 意识形态与乌托邦：大众文化研究的辩证法 /1

一、导语 /3

二、作为“元话语”的意识形态与乌托邦：从卡尔·曼海姆到 F. 杰姆逊 /9

三、文化研究与意识形态和乌托邦理论 /33

四、大众文化逻辑的理论内涵 /40

五、爱慕者的爱慕者：大众文化时代的知识分子 /45

第二章 意识形态理论与理论的意识形态 /53

一、通向文化领导权：文化霸权 /58

二、温和的文化“意识形态”：文化研究 /65

第三章 文化乌托邦：从现代到后现代 /89

一、“大拒绝”中的乌托邦：法兰克福学派 /91

二、意识形态与乌托邦：大众文化与杰姆逊的阐释学 /106

第四章 当前影视文化研究话语考察 / 133

一、电影话语研究 / 135

二、电视研究话语描述 / 156

三、影视文化研究的本土建构 / 182

结语 / 195

参考文献 / 202

后记 / 213

第一章

意识形态与乌
托邦：大众文化
研究的辩证法

一、导 语

到目前为止，仍然需要寻找大众文化逻辑最明显的特征和内涵，并且在突出的文化事件和文化产品中，从动态和静态来寻找这个概念——文化逻辑的统治作用，揭示文化命运的普遍性和文化在特定层面的功能。杰姆逊对于晚期资本主义文化逻辑功能的认识或许适用于此：“文化领域的真实功能，在于把具体世界里的诸般现象以镜映的形式反射在自身之上。这些形式包括虚有其表的假意类同，批判讽刺的尖锐控诉，以至于透过一种乌托邦式的创楚痛斥现存世界之腐朽。”^① 在此，不仅是文化实践而且是对文化实践的话语表述，进入到本文对大众文化社会知识的考察中。笔者认为，对于作为大众文化主要样式的影视文化实践和研究话语的再认识，需要在建立“大众文化学”之前，建立一门学科——影视知识社会学，考察三种话语——主流、民间、知识界的表述，勾勒影视文化研究的范畴、方法、规律和理论框架，而这一切基于对两种对象的研究——电影与电视。

① 杰姆逊：《后现代主义，或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见《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第504页，三联书店1998年版。

1990年代以来中国的大众文化现实在不同的话语中获得了比较肯定的内涵，虽然这个内涵连同大众文化本身还在发展中。不妨这样设想：所有被定义为次文化的大众文化样式构成了这个时代的文化合唱——报刊的衍生和运作、新闻的标题革命、电视媒体的制播分离等突出事件、电影“9550”工程、文学的“私人写作”——这些都增加着我们对时代的感受，左右着我们的日常生活。

不仅如此，对社会知识的文化状况尤其是对时代精神、伦理、道德和内心生活取向的判断，也成为这个时代合唱中的篇章。1990年代以来，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的论争、民族主义与新儒学的联手、主流意识形态和差异性意识形态在文化文本中的生产，约略勾勒出我们时代的精神状况。置身大众文化现实中，不断阅读着那些在不同程度上表达生活经验和理性认识的文化言说，对于社会知识的渴求和对于自身的再认识，便成为大众文化研究者的命定。知识分子，这些时代的守望者，更会在自己的话语行为和实践行为中企图窥见时代的真理。

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呢？是经典叙事的坍塌和话语的喧哗，是以现代化的道路追求现代性的实现，而最终出现反现代性后果的文化现实，是主流、知识分子、民间语文三种知识话语的交织和渗透，像星星在无垠的大众文化地形图上空的闪现……我们看到这些，我们只能面对自己遭遇的历史。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在此重现，印证着对社会历史发展与社会知识之间关系的洞见：“历史并不是作为‘产生于精神的精神’消融在‘自我意识’中，历史的每一阶段都遇到有一定的物质结果、一定数量的生产力总和，人和自然以及人和人在历史上形成的关系，都遇到有前一代传给后一代的大量生产力、资金和环境，尽管一方面这些生产力、资金和环境为新的一代所改变，但另一方面，它们也预先规定新的一代的生活条件，使它得到一定的发展和具有特殊的

性质。”^①

在大众文化空前渗透进日常生活的历史语境中，电影、电视是最为日常化的文化文本，是当代社会商品社会伦理确立的实践者和引导者，是作为象征行为的视觉文化文本。而电影电视的传播又是社会思潮中的一个话题和文化解决的一部分——意识形态的辖制本能与乌托邦的冲动同时存在于文本和文本流通引起的传播过程中，也存在于对于文本和流通过程的研究中，并且后者作为理论表述的形式在学术领域留存。而作为大众文化的后果，金融经济的运行、文化意义的产生以及在这两个层面上的生产与再生产，是认识这个社会的现状和趋势的一个窗口，为文化意义的生产提供一种读解的可能。

视觉时代的理论家已经发现了许多文化生产的秘密，这些秘密的揭示基本是在精英立场上描述了1990年代的中国大众文化状况。在更早的时候，《当代中国大众文化研究》（黄会林、尹鸿）、《世纪晚钟》、《人与故事》（高小康）等著作，显示着大众文化研究初创阶段的敏锐，也已经被视为比较全面显示大众文化样式风貌的学术产品。到现在，政治一体化下的经济与文化的联手（尹鸿：《世纪转折时期的中国影视文化》，1998，北京出版社）、政治假经济之手行使文化领导权（戴锦华：《隐形书写》，2000，江苏人民出版社）等文化生产的政治经济学已经成为学术界的共识，而这些理论发现及其依托的文化现实大约在1998年之前。在这个起点之后的社会现实和相应的理论描述是什么呢？海量增加的不仅是文化样式和文化行为，更有大量译著的出现，使得我们勾勒出本土大众文化研究的谱系学显得相当困难。

在西方，文化工业的研究和大众文化逻辑的揭示是由以下的学术流派完成的，这些人物、流派及其理论构成了本文的研究对象：葛兰西的文化霸权（Hegemony）理论、法兰克福学派、英国文化研究学派、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的反思社会学理论、

① 《德意志意识形态》，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5卷，第30—243页，北京，1958。



电影《十面埋伏》

杰姆逊的马克思主义阐释学、鲍德里亚 (Jean Baudrillard) 的后现代理论、费勒斯通 (Mike Featherstone) 的消费社会与后现代主义理论。同时, 作为文学/文化研究的主要工具, 符号学—结构主义、叙事理论、观众中心批评、类型研究、意识形态批评、精神分析、女性主义等理论形态也以不同的程度进入了电影、电视研究, 在与中国文化实践结合的过程中, 其理论内涵本身有了重大的延伸。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 1990 年代以来在大众文化研究中, 西方理论重新进入中国。这一次是社会学、传播学、文化研究、政治经济学研究等社会科学分支, 远远超出 1980 年代西方理论引进的学科范畴——作为中国本土文化解放运动工具的美学、文艺学 and 经济学等。还有一个重要的特点, 理论的引进和转化从时间的纵向移植转化到空间平列, 原来的“知识爆炸”在 1990 年代已经是最平常的学术交往。举例来说, 当杰姆逊 1998 年关于后现代最新、最全的著作《文化转向》在 2000 年就已经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发行的时候, 我们应该意识到, 仅仅在理论界, 全球化已经不是遥远的事情, 而是我们学术环境的现实。连同文化研究学派和诸多语言学派、社会学派、传播学派在内的学术著作的大量增加, 使理论工作者比 1980 年代更面临了一个难题; 仅仅在学术建制方面, 如何正确对待西方的理论资源, 如何在不同的研究方式中找到真正与本土文化和本土学术相关的方法论, 完成本土大众文化与批评的理论框架的建构, 就成为一个

现实的文化问题。

知识社会学，具体地说是曼海姆（Karl Mannheim）和舍勒等人对于社会知识与时代思想状况之间关系的分析，对于把握这些西方理论资源有重要的认识论作用。即使在1990年代末大众文化研究界最热的“文化研究”，其源头也可以追溯到曼海姆的知识社会学中。^①更重要的是理论肌理，它是探明社会知识的性质和功用的，在每一种社会文化理论的谱系学中，学术资源的立场也可以相对清晰地显现出来。意识形态与乌托邦的理论，不仅是面对当时社会现实的思想体系，也为厘定认识社会文化诸理论提供了方法论，它实际揭示了在大众文化实践中蕴涵的整合思想与颠覆现实的辩证关系。比如，拿它来考量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和艺术理想，就不仅能够认识那种看似极端的批判视点，而且可以清楚地感知这种理论本身的意识形态倾向：在大量的过激的言论中显示着那个年代欧洲知识分子的社会乌托邦思想。而当法兰克福的“人本”思想和决绝的批判立场应用到对中国大众文化的批判中时，却应该在历史化的过程中把握其思想精髓，不能使决绝批判成为绝对的态度，而忽视当代大众文化实践中的乌托邦因素。从性质的判断到引进与吸收，从分析文化现实到抽象出本土的理论框架，中间需要考虑当代不同的意识形态需求和文化生产批评。

“作为相对稳定的观念和表述体系，伟大的文本总是为我们体验和测绘变化中的历史事件和内心生活提供了必要的支点。”^②在这个年代，最伟大的革命发生在无形的经济现实之中，最现实的柴米油盐行为蕴藏了大时代的秘密，而内心生活，在现代人孤独的寻找和自恋中成为奢侈品，自恋成为交往绝望的必然后果。知识分子观念和表述体系首先面临了命名的困难，等到积聚了心力表达的时候，却还要寻找“大众”。何况，全球化和现代化

① 关于这一点，参见刘小枫对曼海姆思想的评价和辩护，《现代性社会理论绪论》，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版。

② 瓦尔特·本雅明著，张旭东、王斑译：《启迪》（Illuminations），牛津大学出版社（香港）1997年版。

的迷茫，连同对当代社会现状的判断也构成了无形的壁垒。但是，不需要盗火者的年代，或许更迫切地需要属于自己的伦理，这种伦理除却对身体和感官的迷恋，永远要进入到形而上的层面，才可能完成本雅明意义上的“赎救”。

现时代的知识分子，保留了反省的权利。在社会分工角度和历史形成的脉络的意义上，当代中国知识分子需要在自我意识的公众化、理论化中寻求自我从而也是大众的赎救。生活在大众文化时代，反思的对象由以下几点构成：大众文化比如电视本身、大众文化的知识谱系学、主流意识形态和差异性意识形态对于文化走向的合力作用……凡此种种，正是本文的目的和出发点。虽然每一个人都会追究理论的现实意义，力图不仅仅在象征层面上解决社会文化问题，但是，处于过渡和转型时期的知识分子的文化任务，不仅是新的启蒙，而且是自我的赎救——理论言说的最终目的存在于这个过程中，而所有善意的期盼将会遭遇同样善意的苦苦寻求。

二、作为“元话语”的意识形态与 乌托邦：从卡尔·曼海姆到 F. 杰姆逊

（一）概念辨析

1. 意识形态

在中国影视文化研究的语境中，中国学术界对于“意识形态”的重新叙说和应用大部分是由于1987年那篇著名的《意识形态与意识形态国家机器》（Louis Althusser 著，李迅译：《当代电影》1987年3、4期连载）。此后，在各种原创和译介的著作中，《意识形态的终结》（张辉）、《茫然失措中的生存竞争》（王一川，1989）、《美学意识形态》（伊格尔顿著，王杰译）、《读资本论》（路易·阿尔都塞、艾蒂安著，李其庆译）、《政治无意识》（杰姆逊著，陈永国译）等增加了这个叙事的丰富性。在更为久远的话语传统中，意识形态与政治的等同关系已经是司空见惯的事情，发生这种情况的原因首先是中国长期的政治斗争环境使得从文化领导阶层到普通百姓形成了一种认知社会的机制——